

On Literary Activities

文学活动论

马大康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On Literary Activities

文学活动论



马大康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活动论/马大康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308-10729-7

I. ①文… II. ①马… III. ①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3282 号

文学活动论

马大康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北京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32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729-7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目录

序	(1)
绪论 立足边界思考	(1)
文学活动论：打开新的理论视界	(5)
第一章 文学活动：质疑文学本质论	(7)
第二章 文学活动：新的逻辑起点	(19)
第三章 文学活动·文学事件·文学作品	(37)
第四章 文学活动：处在“过渡状态”	(54)
第五章 文学活动：置身“边界文化”	(72)
社会转型与文学活动蜕变	(87)
第六章 文学活动：从“创造”到“生产”(上)	(89)
第七章 文学活动：从“创造”到“生产”(下)	(112)
第八章 文学活动：从“鉴赏”到“消费”	(134)
第九章 现代大众传媒与欲望化写作	(148)
第十章 注意力匮乏时代的文学批评	(165)
第十一章 世纪之交的文化政治	(177)

| 文学活动论 |

第十二章 电子媒介霸权下文学活动的文化生态	(185)
第十三章 人类活动交互作用中的审美	(206)
文学活动论的理论资源	(233)
第十四章 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特征及其现代转变	(235)
第十五章 爱德华·巴罗的“心理距离说”辨析	(250)
第十六章 本雅明论艺术与技术	(262)
第十七章 巴赫金的“边界”思想	(281)
第十八章 接受美学在中国(上)	(303)
第十九章 接受美学在中国(下)	(330)
后记	(346)

绪 论

立足边界思考

站在书橱前，面对身着华丽外衣的书籍，我们不能不相信，这就是文学作品。那是我们随手就可以拿来阅读，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文学作品。这似乎已成为常识。那一页页文章、一行行文字，明明白白展示在眼前，正是从事文学研究最实在的对象。考证、注释、分析、阐述，我们都针对这实实在在的对象。可是事实上，这些研究却并非针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也非“文学的”研究。你可以对它们做版本考证，做文献索引，做文字考释、作家考辨、出版溯源、书籍分类等，凡此种种，只能是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社会学、图书馆学的研究，充其量不过是“文本”研究，恰恰不是针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

文学作品只存在于文学欣赏过程中，存在于每个读者对文本的“具体化”中。这，正是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文字作品的特征所在，也是文学作品有可能得以生命永存的缘由。只要文学作品活着，它必定是以不同的方式活在一代代人的阅读欣赏中；否则，就已经沦为丧失生命的躯壳，一个僵尸般没有气息、不会再生育的文

本,它只能用作考古的对象。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学原文并不存在于书架上面:它们是表达意义的过程,只有在读者阅读实践中才能具体体现出来。就文学的产生来说,读者完全和作者一样必不可少。”^①当我们将文学作品视为意义表达的过程,视为读者对文本的具体化,那么,作品就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学事件”,读者就成为作品内部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构成力量,是文学事件的亲历者。文学研究应以流动变化的文学事件为基本对象,研究文本与读者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共同生成,也即研究“文学活动”。

文学创作、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都是文学活动,它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展开的。文学作品则是文学活动展开过程而生成的文学事件。即便是作家,也只能是处于文学创作活动状态中的个体,而非日常生活中的“他本人”。如此,我们便找到文学研究一个新的逻辑起点:文学活动。

以文学活动作为逻辑起点,新的问题域就展现出来了。我们看到,文学活动是多种意向性关系相交织、相转换的活动,总是处在“过渡状态”,但又是以审美关系,也即虚拟意向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活动。正是文学活动将现实的生活世界与文学的虚构世界连接起来,它就发生在现实与虚构相交接的“边界”,是个亦真亦幻的世界。文学的所有特征都源于文学活动的边界性:文学独立性与文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4页。

学功利性、审美自律性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移情与外位性、参与者与旁观者、自我与他者、意识与无意识、主体性与无物无我状态……种种相互矛盾的状况、特征都可以从复杂多变的边界活动中得到解释。从文学活动出发,我们实际上就已经站在边界上来展开思考了。在这里,充满着各种矛盾、对话、交流、转换、变化和狂欢。边界是蕴含最丰富的地带,也是最不稳定、瞬息变幻、生机勃勃的地带,理论本应抓住边界,深入思考发生在边界的活动。它是我们揭开文学谜底的一道裂隙。原先,文学理论美学转向与文化政治转向所构成的理论分歧,也在对文学活动的分析中得以化解,从中我们看到,上述理论究竟是在哪个层面上对文学活动作出有效阐述,它们各自的洞见和局限又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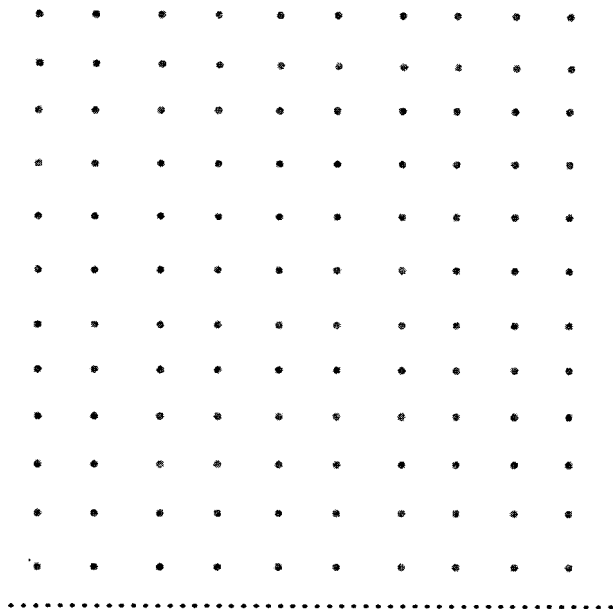
文学作为一种活动,它只能在时间维度上展开,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不可能有着永恒不变的本质。特别是处身社会转型的时代边界,我们不能不因文学活动不断“变脸”而深感震惊。

以文学活动作为逻辑起点,并非排斥文本研究和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诸方法的研究,事实上,只有以文学活动作为逻辑起点,才能将种种方法都融入文学研究之中,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避免了以往文学理论的“拼盘”式组合。文学活动将作家、文本、作品、读者、社会历史诸因素都融合在一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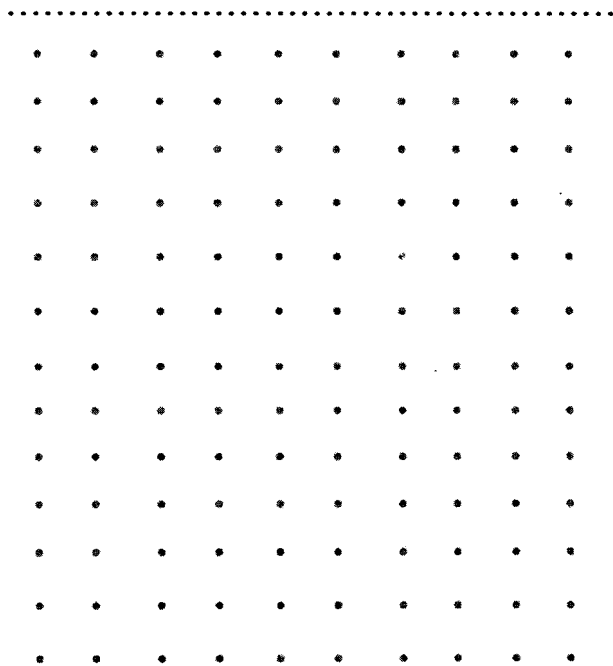
本著作并非要从文学活动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来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只是以文学活动作为视角,作为切入点,立足边界来思考几个“边界”问题,即思考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观念冲突、时代交替之际文学活动的变化迹象,等等,从理论的边界、时

代的边界,努力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全书大体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至第五章,在批判文学本质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学理论新的逻辑起点:文学活动,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澄清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三章阐述作为“事件”的文学作品的开放性,指出它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双重品格。第四章讨论文学活动过程审美自律性与文学意识形态性的关系,以及文学理论美学转向与文化政治转向的关系。第五章从文学活动的“边界性”入手,揭示文学基本特征形成的因由,并进一步深入分析文学既受权力和意识形态掌控,又抗拒权力和意识形态这一内在矛盾的形成机制。第二部分,其中第六章至第十一章探讨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某些重要变化。第十二、十三章试图从宏观上对这些变化的原因做出分析说明。第十二章着重阐述电子媒介与文化生态的关系,第十三章简明分析人类活动特别是消费活动对审美活动的影响。从电子媒介和消费活动两种影响因素的关系来看,是后者决定前者,没有消费活动地位的变化,特别是对信息消费的需求,电子媒介及互联网是不可能产生和迅速发展的。一个日出而作、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即便上天将计算机和网络恩赐给人,它也会被弃置一旁,如一口死井,最终被填满垃圾,不再清泉汩动了。此外,第十三章还对当前我国美学界出现的论争做出阐述。第三部分,其中第十四章至第十七章讨论中外美学和文学思想中的几个问题,这些内容恰恰构成上述各章的重要理论资源,第十八、十九章所讨论的接受美学则是本著作所借重的方法。



文学活动论： 打开新的理论视界



第一章

文学活动：质疑文学本质论

—

本质主义的幽灵仍在文艺学中徘徊，这个幽灵就是“文学性”。

随着消费时代临近，人们不能不感到：文学的边界正在消蚀，文学与非文学日渐变得难以辨认区划了，审美也被泛化，日常生活化了。文学边界消失，令靠文学吃饭的学者们意识到饭碗被砸的危机，于是就有不少人赶紧抬出“文学性”来供奉祭拜。是的，文学虽然因边界消失而悄然颓靡，而“文学性”却相反地在蔓延，这毕竟足以让身处危机之境的学者们宽慰的了。

当年，俄国形式主义请出“文学性”，是为了给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划定疆域，为文学的自律自治提供条件，奠定基础。罗曼·雅克布逊这样说：“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亦即使某一本书成为文学作品的那种东西。”^①同样，诗歌研究则应注重“诗歌

^① [捷]库尔特·康拉德：《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佟景韩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第519页。

性”：

诗歌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词使人感觉到是词，而不是所指对象的表示者或者情绪的发作。表现在词和词序、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不只是无区别的现实引据，而都获得了自身的分量和意义。^①

很显然，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诗歌性”，正是为了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强调文学研究必须专注于文本自身，专注于“词和词序、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而将所指对象的表示者或者情绪的发作、所指涉的现实都撇开，抛到九霄云外，文学研究也因此开始向内转。同时，“文学性”、“诗歌性”则成为文学、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字作品，获得自身品格的“质”的规定性。当文学的本质不再与现实相关联，而是跟现实了无干系的“文学性”的时候，“文学性”就不仅仅是界定文学的标志，而且跃身为文学追求的目标，文学也就开始与现实疏离开来了，它日渐成为一个自主自律的王国。

可是，当下“文学性”在被淡忘了多年之后突然间重又声誉鹊起，却完全是出于另一种原因。它不是为了固守文学自律的堡垒，甚至不是为了去救正处身危机之中的文学的命，恰恰相反，是为了让文艺学适应文学边界消解的“后现代”语境。可以说，哄抬“文学性”的人还很有那么一点幸灾乐祸、暗自窃喜的味道。随文学危机

^① [捷]库尔特·康拉德：《再论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佟景韩译，同上书，第530—531页。

而至的“文学性”的扩张，不正好为研究者带来新机遇，可以趁势攻城略地，扩大势力范围，以至于可以自由自在驰骋于渺无际涯的文化研究的旷野？

不管“文学性”是为了加强文学的自律，强化文学的文体特征，还是为着破除文学固有的樊篱，意在让文学研究不再受对象局限，以求得自由放浪，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否存在那么一个被叫做“文学性”的东西？

其实，并不存在一种叫做“文学性”的东西。所谓的“文学性”倒是主观武断地设定了文学的概念和边界，然后才从中抽象出来的共性；反过来，又用抽象出来的“文学性”来界定文学。“文学性”本身是循环论证的结果。

“文学”这个概念并非古已有之，它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关于文学的现代思想，仅仅可以上溯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文学”以及欧洲其他语言的类似说法，总体上看仍意味着“文章”，甚至“书本知识”。在莱辛1759年发表的《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中，“文学”一词开始包含了现代意义的萌芽，指现代的文学生产。史达尔夫人的《论文学》则真正标志着文学现代意义的确立。^①我国古代亦然，只有诗文之别，文笔、韵散之别，而无文学、非文学之分。至于“文学”这一词，或指孔门四科之一的文章博学，或指文献经典，或为官名，而无现代含义。至章炳麟《文

^①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性》，[加]马克·昂热诺、[法]让·贝西埃、[荷]杜沃·佛克马、[加]伊娃·库什纳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9—30页。

学总略》还说：“惟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彰彰为准。”^①大凡书之竹帛的文字作品都可以囊括其中。倒是王国维《文学小言》对文学所做的界定，才可以说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而“文学性”则是在有了“文学”这一现代观念，并且出现了一批靠研究文学吃饭的人，为了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文学学科，打造自己的招牌才提出来的。

文学性的定义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作为鉴定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而是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利用这些工具，阐明文学最基本的风貌，并最终指导文学研究。^②

卡勒说得很清楚，不是文学本身需要“文学性”，而是文学研究、文学理论需要“文学性”。所谓“文学性”，就是因为有了文学研究者，于是，才从他们鉴定的“文学”中抽象出来的。首先，文学的圈子是由他们划出的，文学这一头衔是由他们授予的，然后再从经他们界定的文学中抽绎出“文学性”来，以此标榜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文学”和“文学性”这些概念，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分工细化、专业化，以及理性冲动所导致的学科明晰化的成果。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表面看，文学已经有了确定的含义，它包括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而事实上，它的边界从来没有

①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下，中华书局，1963年，第370页。

②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性》，《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第29页。

能够真正划定,就像诺思罗普·弗莱所说:“我们没有区别文学的语辞结构和非文学的语辞结构的实际标准,对许多很难归类的书籍也并不抱有明确的看法。”^①只要我们稍稍留意所谓“文学”的边缘地带,就不能不感到文学、非文学之间区划的困难: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条楚河汉界!既然边界无法划定,又怎么能从中抽象出共同的“文学性”呢?就譬如我们仍旧按照古人的“经、史、子、集”四部来划分文字作品,那是永远也得不出什么“文学性”的。文学犹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现象,各种文学文体之间虽然存在着关连性,却无法找到共同的“文学性”。卡勒关于“文学性”的论述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漏洞:他意识到文学是无法下定义,无法划定边界的,于是转而去寻找“文学性”,似乎可以避开文学边界问题,去找出文学的共同特征。岂料一旦将文学边界问题悬置起来,与此同时,也就使得“文学性”变得捉摸不定,难怪对“文学性”的探寻至今无法获得定论。“文学性”必须以确定文学边界,确定什么是“文学”作为前提,而这个前提本身却是虚幻的。巴赫金则指出:文学中的重要门类——小说,几乎囊括了所有语言种类,具有“全语体性”。既然文学可以包容所有语言种类,是“语言的共和国”,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那种文学独自享有的“文学性”的存在可能。

《问题与观点》的译者史忠义也似乎感觉到“文学性”研究中潜

① [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16页。

伏着危机。在“代译序”《关于“文学性”的定义的思考》中，他说：

笔者以为，关于“文学性”定义的长期的苦苦求索，反映了西方学者们追求科学准则的良好愿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这是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优良传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问题，上述追求中包含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成分。

即便如此，他依旧以为“‘文学性’是人类在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比较笼统、广泛、似可体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概念”。并跃跃欲试地为它下定义：“文学性”这种定义“应该是宏观的、开放性的定义，而非微观意义上的标准”。^①可是，一个定义一旦成为“宏观的”、“开放性的”，兼收并蓄，无所不包，模棱两可，它还有其具体内涵吗？还成其为“定义”吗？这种试图找到寄生于文学身上的“文学性”或开始背弃文学四处流窜的“文学性”的做法，说到底，也仍然“包含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成分”。

特里·伊格尔顿是一位文学反本质主义者。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的‘本质’。任何一篇作品都可以‘非实用地’阅读——如果那就是把原文读作文学的意思——这就像任何作品都可有‘以诗的方式’来读一样。”甚至是列车时刻表，也可以把它“作

^① 史忠义：《关于“文学性”的定义的思考（代译序）》，《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第5—6页。